



昆明穆斯林社群 :1274~2000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2)01-0065-13

● 马雪峰

[摘要] 元代时,昆明已形成较大的穆斯林社群。在 13 世纪到 19 世纪的近六百年时间里,这一社群在昆明一直和平发展,最终形成“五坊”穆斯林社群的传统格局。然而,在 19 世纪中叶的“咸同事变”中,昆明穆斯林社群被完全摧毁。经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到 20 世纪 50 年代时,昆明穆斯林又重新恢复了传统的“五坊”格局。半个世纪之后,在各种现代性因素的作用下,昆明穆斯林社群传统格局最终解体。

[关键词] 昆明 穆斯林社群 五坊 解体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昆明,现为中国西南边疆云南省的首府,自古是中国西南边地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作为城市的昆明,其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①昆明处于中国西南边地,紧邻东南亚,自古以来文化与人群皆呈多样性。自元代以来,穆斯林即为昆明最重要的人群之一。

昆明穆斯林社群的形成、解体与恢复(1274~1958)

一、形成

[基金项目]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多族群聚居地区族群关系的变迁与现实——以昆明为例”(项目批准号 08CSH029)的中期成果。本项研究,还得到“亚洲资源基金会”(ARF, Asian Resource Foundation, Research Fellowship Programme for Young Muslim Scholars)的资助。

① 马颖生.马颖生史志论著选[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162.

伊斯兰教何时传入昆明,学界说法不一。据民间传说,“文革”扫“四旧”时,曾发现过一块阿拉伯文碑,碑上记载:唐朝之时,四十位阿拉伯长老途径昆明去长安,其中有一位叫满苏啦的长老在昆明逝世并葬于昆明。唐天宝七年,有十六七户穆斯林在昆明建立了一个礼拜堂,后来发展到四十多户,正式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南宋时,寺因战乱被毁。^①但上述说法,至今已很难考证。

但是,穆斯林在元代大量进入昆明,当是无疑。1253年,忽必烈与兀良合台“元跨革囊”平大理,将云南正式纳入元朝版图。这是中央政权对云南实施有效管理的开始,也是穆斯林大量进入云南的开端。南征大理之前,蒙古人征服了中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广大地区。蒙古人在对大理及南宋的战争中,从中亚征募了大批穆斯林军士、商人以及工匠,以穆斯林为主要成分的探马赤军参加了征服大理和南宋的战争。战争结束后,这些穆斯林或为官,或从军,或从商,或屯垦,安居各地。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穆斯林进入云南地区。^②

1274年,忽必烈任命在布哈拉(Bukhara)出生的穆斯林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Sayyid Ajaj Shams al-Din Omar, 1211~1279)出任首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赡思丁将首府迁至昆明,大批穆斯林随其落籍昆明。因此,元代时,昆明形成了较大的穆斯林社群。据说赡思丁曾在昆明建有12座清真寺。^③清朝光绪年间戴纲孙编纂的《昆明县志》卷四“祠祀上”提到昆明的清真寺时说:“清真寺二,一在丽正门内,一在鱼市街,皆元平章赛典赤·赡思丁建。”^④李元阳编纂的《云南通志》卷十三“寺观”中也提及:“(昆明)清真寺有二,一在崇正门内,一在崇正门外,呼礼拜寺,俱元平章赛典赤建。”《马可·波罗行记》也对元代昆明穆斯林的情况有所记载,其中提到:“(押赤城)^⑤城大而名贵,商工甚众。人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聂思脱里派之基督徒。”^⑥波斯学者拉施特(Rashid Al-Din Fadl Allah, 1247~1318)的《史集》说到哈刺章省(云南省)的首府押赤城(昆明)时,也曾言及“该处居民全都是穆斯林”。^⑦因此,元代时昆明已形成较大的穆斯林社群,是可信的。

从13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穆斯林社群在昆明和平发展。到19世纪中叶时,昆明城内

① 王运芳.昆明地区清真寺调查[A].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99.昆明市宗教事务局、昆明市伊斯兰教协会.昆明伊斯兰教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1~2.张弘、王小晓、张风云.昆明回族伊斯兰教概况[A].云南省编辑组.昆明民族民俗和宗教调查[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14.

② 杨兆钧.云南回族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26~31;姚继德、李荣昆、张佐.云南伊斯兰教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55~58.

③ 王运芳.昆明地区清真寺调查[A].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98.

④ 戴纲孙.昆明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69.

⑤ 即昆明。

⑥ [意大利]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284.

⑦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33.



已有五座较大的清真寺,即顺城清真寺、南城清真寺、东寺街清真寺(即永宁寺)、陕西清真寺及鱼课司清真寺,另外,还有作为陕西清真寺附寺的东门清真寺(即今日金牛清真寺)。^①穆斯林围寺而居,主要分布在珠玑街、三市街、金牛街、南通街、羊市口、顺城街、大南门等街道,^②形成五坊(五方)清真寺的穆斯林社群格局,其规模当在2000户以上。^③

二、解体与恢复

19世纪中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中国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格局,也彻底改变了昆明穆斯林社群。1856年4月中旬,清政府在昆明制造“丙辰惨案”,屠杀昆明穆斯林两千余户,两万余人,^④“诸寺皆毁于兵火,居民死之略尽……户口三十中仅存其一矣。”^⑤昆明城内穆斯林几乎全部被屠戮。^⑥

“咸同事变”之后,少数逃亡的穆斯林回到昆明,云南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因经商、求学等故,也不断迁至昆明,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昆明穆斯林社群逐渐得到恢复。据江雪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的调查,民国年间,昆明市内共有六座清真寺,即南城清真寺、永宁清真寺、顺城清真寺、金牛街清真寺、崇善社清真寺(又名崇善公)^⑦及南通寺^⑧。另外,据王运方《昆明地区

① 昆明市宗教事务局、昆明市伊斯兰教协会.昆明伊斯兰教史[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82.王运芳.昆明地区清真寺调查[A].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99.

② 昆明市宗教事务局、昆明市伊斯兰教协会.昆明伊斯兰教史[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84.

③ 清朝光绪年间立的《昆明顺城铺重修清真寺碑记》载:“会城(昆明)回民,当康熙时,约记二千余户,附郭以居。”民国时期立的《迁葬清咸丰丙辰年昆明五方被难回教亲友碑记》也言及:“清咸丰丙辰之变,昆明五方被难回教亲友二千余户,男女老幼二万余人。”(两碑碑文分别见《昆明伊斯兰教史》第213页、217页)因此,到19世纪中叶时,昆明回民户数在两千户以上,是可信的。至于人口规模,考虑到旧时中国户的规模较大,且有来自各地的穆斯林客居昆明,因此,《迁葬清咸丰丙辰年昆明五方被难回教亲友碑记》提到的“二万余人”,笔者认为也是可信的。

④ 马骢等.迁葬清咸丰丙辰年昆明五方被难回教亲友碑记[A].昆明市宗教事务局、昆明市伊斯兰教协会.昆明伊斯兰教史[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217.

⑤ 昆明顺城铺重修清真寺碑记[A].昆明市宗教事务局、昆明市伊斯兰教协会.昆明伊斯兰教史[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213~214.

⑥ 现在,昆明地区的穆斯林,每年农历四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在清真寺恭诵《古兰经》,追祭死难同胞亡灵,形成“亡人节”。

⑦ 即迤西公清真寺。

⑧ 王运方《昆明地区清真寺调查》提到,清光绪以后,在昆明南通街,由做生意的穆斯林建了一所小礼拜寺,叫羊神清真寺(参见王运芳.昆明地区清真寺调查[A].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98.)指的可能就是南通清真寺,也称羊市口清真古寺。(参见昆明市宗教事务局、昆明市伊斯兰教协会.昆明伊斯兰教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149.)

清真寺调查》一文,20世纪50年代初,昆明西边的篆塘也曾建过一座清真寺,称“西门清真寺”。^①南通寺和西门清真寺于文革期间先被强行占用,后被拆毁,^②从此消失。

因此,到20世纪50年代末,昆明穆斯林社群重新形成了以五座清真寺(南城清真寺、永宁清真寺、顺城清真寺、东门清真寺、迤西公清真寺)为核心的寺坊格局。穆斯林围清真寺而居,主要分布在金牛街、珠玑街、北河埂、顺城街、崇仁街、靖国新村等街道,人口规模一万多人。^③

三、穆斯林社群之传统结构

与20世纪50年代末,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相比,20世纪50年代之前,穆斯林在昆明的存在与分布,有其显著的特征。这种特征,我们可以从居住模式与生计方式两个层面来考察。

1. 分布与居住

中国内地穆斯林,无论居于乡村还是城市,传统上皆围清真寺而居,昆明穆斯林也不例外。因此,昆明穆斯林人口的分布与居住模式,与清真寺有密切的关联。

表1 20世纪50年代初昆明穆斯林人口的分布

	人口数	百分比(%)	
一区	2662	21.7	金牛街、珠玑街
二区	465	3.8	散居
三区	746	6.1	临江里
四区	6269	51.2	顺城街、靖国新村、复兴村
五区	不清楚		
六区	125	1.0	大板桥
七区	不清楚		龙头街
八区	138	1.1	
九区	152	1.2	
十区	1699	13.9	
总计	12,256	100.0	

资料来源:根据宋恩常先生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④

① 王运芳.昆明地区清真寺调查[A].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98.

另外,据昆明聂正德老师讲,这座清真寺是建在现在昆明小西门大观商业城附近,为民国时期昆明穆斯林富商马祥龙所捐建。王运方《昆明地区清真寺调查》一文还提及,昆明城郊下马村也曾建有一座清真寺,但此寺情况无从查考,其具体情况不详。但至少1940年江雪调查时不见此寺,记载20世纪50年代初昆明清真寺情况的文献也不曾记载。

② 昆明市宗教事务局、昆明市伊斯兰教协会.昆明伊斯兰教史[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149~150.

③ 据1953年人口普查资料,1953年时昆明回族人口16207人。(参见云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云南省统计局人口处、云南省公安厅三处.云南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8[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486.)据宋恩常先生《解放初昆明回族社会经济调查》提供的数据,“本市回族12283人”,这主要指的是昆明城区回族人口,其中金牛街、珠玑街2662人,顺城街、靖国新村、复兴村6269人,临江里一带746人。(宋恩常.解放初昆明回族社会经济调查[A].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④ 宋恩常.解放初昆明回族社会经济调查[A].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76.



20 世纪 50 年代初,昆明十个区中穆斯林人口的分布,如表 1 所示。昆明市穆斯林人口,主要分布在市内一区 and 四区,即金牛街、珠玑街、顺城街、靖国新村、复兴村等处。一区金牛街、珠玑街一带穆斯林人口 2662 人,占市内穆斯林人口的 1/5 强。四区顺城街、靖国新村、复兴村的穆斯林人口 6269 人,昆明市内超过一半的穆斯林分布在这个区。一区 and 四区,集中了昆明市内近 3/4 的穆斯林人口。穆斯林人口分布最为集中的一区和四区,也正是昆明市内五座清真寺所在的区。

因此,如上所述,20 世纪 50 年代末之前,昆明市内穆斯林社群,坊与寺是合一的,称寺坊。寺建在坊内,坊依托于寺。此为穆斯林分布格局之特点。

与分布相关的,是居住的模式。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中国内地城市居民之住房,多为仅有一层的平房,虽有少数楼房,但最多也就二三层而已,现代式的单元楼房并不常见。中国内地多数城市皆是如此,中国西南边地的昆明更是如是,因此,平面化的居住方式,是昆明城市居民居住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昆明穆斯林之居住模式也如是。

因此,分布上的相对集中与平面化的居住模式,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之前昆明穆斯林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此种格局之下,穆斯林围清真寺比邻而居。人们地域上的邻近与日常面对面的互动,为社群之凝聚提供了物质层面的支持。

2. 生计

1954 年,昆明市委统战部曾对昆明市穆斯林的职业进行过较为系统的调查。在那次调查中,调查者将职业划分为九大类——工人、自由职业、摊贩、手工业、服务业、饮食业、坐商、农业企业以及其他,如表 2 所示。

表 2

职业大类	户数	百分比(%)	人数	职工
工人	570	43.4	2191	
自由职业	116	8.8	428	4
摊贩	235	17.9	1060	12
手工业	104	7.9	522	62
服务业	41	3.1	206	11
饮食业	50	3.8	269	37
坐商	85	6.5	424	14
农业企业	58	4.4	275	16
其他	53	4.0	190	
合计	1312	100.0	5565	156

资料来源:根据宋恩常先生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①

从表 2 所列数据来看,20 世纪 50 年代初,昆明穆斯林之主要生计方式乃是经营小本商业,大商业经营者较少。1954 年的调查表明,1312 户穆斯林中有 570 户属工人,占调查总户数的 43.4%,但是,这 570 户穆斯林中,有 210 户属机关职工,这与新中国设立的各种机关以及

① 宋恩常. 解放初昆明回族社会经济调查[A]. 云南省编辑组. 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C].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77~80.

50年代初对工商业的改造有关。因此,可以推断,20世纪50年代之前,穆斯林中工人的比例会更小。因此,20世纪50年代之前,昆明大部分穆斯林主要依靠商业为生,这也是中国内地大部分城市穆斯林的生计方式。此种生计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从业者的“独立性”^①。此种“独立性”,使得穆斯林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小。生计方式的独立性,也保证了人生诸多事项的相对独立性。这与20世纪50年代末之后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上所述,相对集中分布、平面化的居住模式与相对独立的生计方式,构成了穆斯林在昆明存在的一个显著的物质性特征。此种特征,对于穆斯林个体间的互动以及社群之凝聚,有重要的作用。正是此种物质性特征,支撑了穆斯林在昆明的传统存在。

族(坊)与教(寺)的分离:人民中国的回族社群(1958~1978)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人民政府开始在中国大陆开展一系列运动,这一系列运动,对中国大陆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中国内地穆斯林社会,特别是昆明穆斯林社群而言,三个方面的影响至关重要:其一,“回族”的认定与“族教分离”;其二,对宗教的改造;其三,对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回族”的认定与“族教分离”

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在中国大陆全境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最终将中国划分为56个民族群体——1个多数民族(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中国内地讲汉语的穆斯林绝大多数被认定为属于55个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

对于中国内地穆斯林而言,“回族”不仅是一种新的称呼,更是一种新的身份。新中国之前,讲汉语的中国穆斯林通常被称为“回回”或“回民”,伊斯兰被称为“回教”。^②因此,“回回”或“回民”是“穆斯林”的同义词。中华民国时期,“回回”被视为“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是信仰了回教的汉人,政府并不认为“回回”是一个与多数民族——汉人相异的特殊群体,因此,“回”或“回回”所标志的是一个宗教社群,而非民族^③群体,对于“回”的认同,强调的是宗教或信仰。

新中国时期,“回回”被强调为一个民族,即回族,“回族”这一新的称呼被具体落实到每一个成员,并通过身份证上的民族标志而固定化。这种转变,伴随着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全面进入而发生。有关“回回”或“回”的国家话语,强调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有关“回回”或“回”的认同,首要的是对“族”的认同;其次,“族”与“教”即“回族”与“回教”,应当分离。

① 此处之“独立性”指的是相对于20世纪50年代末之后的状况而言。20世纪50年代末之后,随着政府对工商业改造的完成,所有城市居民皆被纳入政府主导的“单位”之内。依附于各种单位的城市居民,对单位之依赖性较大,人生诸多事项皆须依靠单位来解决,从医疗、住房到孩子教育等,无所不包。

② 在台湾、香港以及澳门等地,伊斯兰教现在仍被称为“回教”。

③ 新中国的“民族”概念,借自日语,而日语的“民族”则是对英文 nation 的翻译。因此,新中国的“民族”概念强调的一个重要层面是其政治性含义。另外,“民族”概念还强调人群的生物性意义。因此,“民族”被视为政治单元,也被视为血缘共同体。



1956年6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关于伊斯兰教名称问题的通知》,要求不再使用“回教”这一称谓,一律改用“伊斯兰教”。^①从此,在中国大陆官方话语中,“回教”一词不再出现。又由于中国社会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有很强的政府主导色彩,“回教”一词在民间话语中也几乎绝迹。Islam在中国的称谓转换因国家权力的介入而完成。

在学术界,白寿彝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论证了“回族”与“回教”分离之正当性。在发表于1951年11月的《回回民族的新生》一文中,白寿彝认为,伊斯兰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并不只有回回民族信仰,因此,把回族与回教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回族除了宗教信仰外,还有更多的特征。^②在1960年2月发表的一篇题为《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他进一步论证说:“一个穆斯林,可能是回族人,也可能不是回族人而是别族人。一个回回,很可能是穆斯林,但也不一定就是穆斯林。”在论及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时,他说:“错误地把二者混同起来,这不仅不符合事实,并且在现实生活上有很大的危害。回族在不断发展,这种发展,是回族人民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发展,决不能以宗教是否发展作为衡量的尺度。如果把宗教和民族混同起来,或者强调宗教的作用,那末就会束缚了回族人民在民族大家庭中力争上游的手脚。”^③

因此,在新中国时代的国家话语中,有关“回回”或“回”的认同,首要的是有关“族”的认同。有关“族”的认同被强调和鼓励,而有关“教”的认同,在无神论的框架下被消解。

二、对宗教的改造

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中,宗教多被视为落后且有害的事项。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涉及宗教的各种运动,皆以此种认识为指导。1958年,党和政府开始在伊斯兰教中进行改革,许多阿訇被划为“右派分子”,被迫接受社会主义再教育。“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的口号下,清真寺有的被占用,有的被拆毁,不少经籍文物被付之一炬,昆明城区清真寺无一幸免。云南省革委会发布了第45号文件,规定了对回族的“十不准”,严禁一切宗教活动和与宗教有关的习俗。^④清真寺中原有的经堂教育也中断了。有的地方强迫回族养猪,吃猪肉,穆斯林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1973年,穆斯林要求贯彻宗教信仰政策,发生了震动世界的“沙甸事件”。

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各种运动中,宗教作为落后且有害的意识形态而遭到批判,一切与宗教相关之事项,皆缺乏存在之合理性。因此,在意识形态层面,宗教被批判,宗教功修被禁止,甚至与宗教有关的习俗也被认为是落后的“陋俗”,而被要求变革;在物质层面,宗教财产被没收。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有关宗教的任何事项都是不被鼓励的。因此,就有关“回”或“回回”的认同而言,对“族”的认同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被强调,相对的,对“教”的认同在时代的氛围中被消解。

① 参见 <http://www.people.com.cn/item/flfgk/gwyfg/1956/112707195601.html>

② 白寿彝.回回民族的新生[A].民族宗教论集[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01~102.

③ 白寿彝.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A].民族宗教论集[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92~194.

④ 昆明市宗教事务局、昆明市伊斯兰教协会.昆明伊斯兰教史[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133~134.

三、对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之中国社会,党和政府对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改造,其基础在于对社会物质层面的改造。这种改造,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土地改革运动,在城市,则主要表现为对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根本目的,在于消灭私有制,具体的做法是通过改造,将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变成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集体经济和国营经济。

对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推行。昆明市的手工业改造,1953 年开始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行。1956 年,昆明市基本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原有的个体手工业全行业转变成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饵块业 51 户成立了饵块厂,米线业数十户成立了米线厂,养奶牛户并入了昆明市乳畜公司。饮食业也成立了合作社,摊贩业 1958 年成立了合作商店,个体经营者成为职工,每月领取工资。^①

昆明市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从 1953 年开始,到 1956 年初完成。改造完成后,私营工商业基本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或国营经济。1954 年调查时,昆明有回族工商业经营者一万两千多名,改造完成后,大多数回族工商业经营者变成了国营或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

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从一定意义上讲,意味着城市居民生计方式的某种颠覆性变革。原来的私营工商业经营者,变成了各种单位的职工。每一个单位都处于社会主义体系的一个环节中,其人事与生产,皆由党和政府的计划所主导。绝大部分的单位,皆有党的支部,职工之思想与生活,也属于社会主义建设之重要部分。随着单位制的完善与发展,每一个单位都变成了一个小政府,负有管理本单位职工之思想与生活之重要责任。人们生活所需之绝大部分东西,如住房、医疗、教育等,皆需要通过单位获得。每一个城市居民,皆被定位在某一个单位之中。

如上所述,党和政府对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以及单位制的发展,对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中国城市居民之整体生活,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标志了民族国家之权力对公民个体之具体生活的整体性影响。对于穆斯林而言,这种影响的关键在于,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中,有关宗教的认同是不被鼓励的,而人的整体性生活,却须依赖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管理,因而,生活与宗教认同之间,存在一种张力。由于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绝对性主导,这一张力很明显地偏向于生活一方。某种意义上,“族”与“教”的分离,造成了“寺”与“坊”的断裂。

1949 年人民中国的成立,是 20 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党和政府发动了一系列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穆斯林而言,本文认为,如上三个方面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内地穆斯林,由民国时代的宗教社群,变成了人民中国的民族群体。与这一转变相伴随的,还有党和政府对宗教的改革以及对人民生计方式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族”的构建与张扬,与对“教”的消解与批判相对应。在特殊的意识形态和时代背景下,“族”与“教”的分离所标志的是整体性的社会生活本身的变化——生活与信仰的断裂。

^① 昆明市宗教事务局、昆明市伊斯兰教协会.昆明伊斯兰教史[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81.

延续与重构:开放时代的穆斯林社群(1978~2000)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调整其政策,在国内实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国门重新打开,中国社会步入了一个新时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国内地城市穆斯林社群当然也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大致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看:其一,宗教政策的重新调整与清真寺的重新开放;其二,城市化进程与城市传统社群结构的终结。

一、宗教政策的重新调整与清真寺的重新开放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对宗教社群的影响,首要的在于,党和政府开始在实践中承认宗教存在之合法性。在历次运动中被关闭和被占用的清真寺,大部分得以恢复。1980年1月,中共昆明市委批准“昆明市伊斯兰教教务委员会”重新活动。政府拨款修缮了顺城清真寺和南城清真寺,永宁清真寺的恢复修缮也得到了政府的部分资助,迤西公清真寺由原占用单位修复后归还,金牛街清真寺也由伊斯兰教协会筹款进行了修理。^①至此,昆明原有的五坊清真寺都得以恢复。宗教活动也逐渐展开,阿訇被重新请回来,清真寺再次聚集了礼拜的人们。

然而,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反宗教运动,在穆斯林大众中,一部分人信仰意识已非常淡薄,一部分人对改革开放后的宗教政策仍然持有怀疑的态度。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大部分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宗教教育,因此,无论是对社群传统还是宗教知识,都知之甚少,意识也较为淡薄。“单位制”对人们生活的解构依然持续着。某种程度上,20世纪80年代的昆明穆斯林社群,即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中。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更是造成了传统社群结构的最终解体。

二、城市化进程与传统社群结构的终结

如前文所述,中国内地城市穆斯林社群的存在,一个很大的特点在于其居住上的“围寺而居”,因而在许多内地城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穆斯林传统聚居区,如北京的牛街、马甸、花市,呼和浩特的回民区等。昆明的顺城街、珠玑街、南通街等就属于此种传统穆斯林聚居区。此种结构特点,对于穆斯林社群的凝聚,有重要的作用。穆斯林依赖彼此地理上的相近,实现个体间的互动与交流,满足信仰与生活诸方面的需要。

然而,这样一种结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生变迁。这种变迁,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其一,“单位制”;其二,旧城改造。

1. “单位制”的影响。如前文所述,随着党和政府对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城市绝大部分的居民都被纳入了各种各样的单位之中,成为各种单位的职工。每一个城市居民各种物质性的需求,均仰赖于单位的供给。由单位供给的诸项物品中,住房是重要的一项。因此,在单位体制下,居民的住房是大致以单位为单元的,即,同一单位的职工集中住在一起。因此,20世纪50年代之后,许多穆斯林迁出了原来穆斯林较为集中的传统聚居区,搬入了各自单位的住宅区。

2. 旧城改造。昆明穆斯林传统聚居街区,多数都位于今日昆明的城市核心地区,如著名的顺城街。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地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昆

^① 昆明市宗教事务局、昆明市伊斯兰教协会. 昆明伊斯兰教史[C].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137.

明传统的穆斯林聚居街区,因多位于城市核心地区,改造之后,多数都变成了立体化的商业建筑区,多数原有居民不得不迁离原居住区。因此,旧城改造的结果,是传统穆斯林聚居街区的消失。2003年,顺城街开始改造,昆明最后一处传统穆斯林聚居街区也未能保留。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昆明穆斯林社群的分布与居住格局的这种变迁,可以从如下的表3中略窥一斑。

表3(1)是1990~2000年昆明城区四个区回族人口的分布状况。穆斯林传统上主要分布在五华区和盘龙区,昆明传统的五坊清真寺也位于这两个区。从1990年的数据来看,1990年时这两个区的回族人口占城区四个区回族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多,因此,超过三分之二的回族人口分布在昆明城市核心地带的这两个区。相对边缘的西山区和官渡区,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回族人口。

表3(1) 1990~2000年昆明市四城区回族人口分布状况

区名	1990年		2000年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五华区	12,433	32.4	11,683	19.6
盘龙区	11,066	28.8	8,899	14.9
西山区	7,812	20.3	14,332	24.0
官渡区	7,119	18.5	24,794	41.5
总计	38,430	100.0	59,708	100.0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第四次(1990年)、第五次(2000年)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①

但是,到了2000年时,这一格局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从2000年的数据来看,五华区和盘龙区,无论是回族人口的绝对数,还是回族人口占四区回族总人口的比例,都明显下降。五华区1990年人口普查时,有回族人口12,433人,经过十年,2000年时,回族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只有11,683人,相对比例从1990年的32.4%下降到了2000年的19.6%。盘龙区的情况也与五华区类似,回族人口从1990年的11,066人下降到了2000年时的8,899人,减少了2000多人,相对比例从1990年的28.8%下降到了2000年的14.9%。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逐渐成为城市之一部分的西山区和官渡区,其情况恰恰与老城区的五华区和盘龙区相反。从1990年到2000年,西山区回族人口从7,812人增加到了14,332人,相对比例从20.3%上升到了24.0%。官渡区从1990年的7,119人增加到了2000年的24,794人,相对比例从18.5%上升到了41.5%。

因此,从表3(1)来看,1990~2000年,回族人口在昆明的分布,是由城市核心的老城区(五

① 昆明市官渡区第五次人口普查办公室.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电子计算机汇总)[Z]. 昆明:昆明市官渡区第五次人口普查办公室,2002.

昆明市盘龙区第五次人口普查办公室. 昆明市盘龙区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Z]. 昆明:昆明市盘龙区第五次人口普查办公室,2002.

昆明市人口普查办公室. 云南省昆明市第四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Z]. 昆明:昆明市人口普查办公室,1991.

昆明市西山区人口普查办公室. 昆明市西山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Z]. 昆明:昆明市西山区人口普查办公室,2001.

华区、盘龙区)逐渐向城市边缘的新城区(西山区、官渡区)扩散。这一人口的扩散过程,实际上自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了,1990~2000 年只不过是这一过程的一种延续。

表 3(2)和表 3(3)是对这一人口扩散过程的细致描述。

表 3(2) 1990~2000 年昆明市五华区各街道回族人口的分布

街道	1990 年				2000 年			
	人数	占四城区回族的比例 (%)	占本区回族的比例 (%)	占本区总人口的比例 (%)	人数	占四城区回族的比例 (%)	占本区回族的比例 (%)	占本区总人口的比例 (%)
华山街道	444	1.2	3.6	0.1	372	0.6	3.2	0.1
北门街道	658	1.7	5.3	0.2	616	1.0	5.3	0.1
西站街道	1359	3.5	10.9	0.4	1578	2.6	13.5	0.4
大观街道	872	2.3	7.0	0.2	886	1.5	7.6	0.2
武成街道	381	1.0	3.1	0.1	224	0.4	1.9	0.1
新村街道	1021	2.7	8.2	0.3	773	1.3	6.6	0.2
崇仁街道	2798	7.3	22.5	0.8	1123	1.9	9.6	0.3
土桥街道	992	2.6	8.0	0.3	1141	1.9	9.8	0.3
西坝街道	1146	3.0	9.2	0.3	1200	2.0	10.3	0.3
虹山街道	395	1.0	3.2	0.1	436	0.7	3.7	0.1
永昌街道	1169	3.0	9.4	0.3	1760	2.9	15.1	0.4
莲华街道	1198	3.1	9.6	0.3	1574	2.6	13.5	0.4
合计	12,433	32.4	100.0	3.5	11,683	19.6	100.0	2.8

资料来源 同表 3(1)。

表 3(3) 1990~2000 年昆明市盘龙区各街道回族人口的分布

街道	1990 年				2000 年			
	人数	占四城区回族的比例 (%)	占本区回族的比例 (%)	占本区总人口的比例 (%)	人数	占四城区回族的比例 (%)	占本区回族的比例 (%)	占本区总人口的比例 (%)
东站街道	1164	3.0	10.5	0.3	1155	1.9	13.0	0.3
拓东街道	1015	2.6	9.2	0.3	647	1.1	7.3	0.2
太和街道	1456	3.8	13.2	0.4	1294	2.2	14.5	0.4
南强街道	339	0.9	3.1	0.1	154	0.3	1.7	0.0
金碧街道	842	2.2	7.6	0.2	629	1.1	7.1	0.2
小南街道	770	2.0	7.0	0.2	272	0.5	3.1	0.1
长春街道	542	1.4	4.9	0.1	293	0.5	3.3	0.1
珠玑街道	1293	3.4	11.7	0.3	519	0.9	5.8	0.2
环城街道	1992	5.2	18.0	0.5	2323	3.9	26.1	0.7
董家湾街道	923	2.4	8.3	0.2	895	1.5	10.1	0.3
东华街道	730	1.9	6.6	0.2	718	1.2	8.1	0.2
合计	11,066	28.8	100.0	3.0	8899	14.9	100.0	2.6

资料来源 同表 3(1)。

表 3(2)是五华区各街道之情况。从 1990 年到 2000 年,五华区每一个街道的回族人口在昆明市四城区回族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都有所下降。回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崇仁街道,绝对人

数从 2798 人下降到了 1123 人,相对比例从 7.3%下降到了 1.9%。西站街道回族人口绝对数虽然有所增加,但相对比例从 3.5%下降到了 2.6%。新村街道回族人口绝对数从 1021 人下降到了 773 人,相对比例从 2.7%下降到了 1.3%。西坝街道回族人口绝对数稍有增长(从 1146 人增长到了 1200 人),但相对比例从 3.0%下降到了 2.0%。

表 3(3)是 1990~2000 年盘龙区各街道回族人口分布的变迁。从 1990 年到 2000 年,盘龙区的回族人口,除了环城街道略有增长(从 1990 年的 1992 人增长到了 2000 年的 2323 人)外,其他所有街道回族人口的绝对数都是减少的,所有街道在四城区回族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都呈下降趋势。拓东街道回族人口绝对数从 1990 年的 1015 人,下降到了 2000 年的 647 人,相对比例从 2.6%下降到了 1.1%;小南街道从 1990 年的 770 人下降到了 2000 年的 272 人,相对比例从 2.0%下降到了 0.5%;珠玑街道从 1990 年的 1293 人下降到了 2000 年的 519 人,相对比例从 3.4%下降到了 0.9%。

表 3(4) 1990~2000 年昆明市四城区人口分布状况

区名	1990 年		2000 年	
	人数	占四城区总人口的比例(%)	人数	占四城区总人口的比例(%)
五华区	356,550	22.1	413,420	14.9
盘龙区	374,070	23.2	360,988	13.0
西山区	332,831	20.6	603,363	21.7
官渡区	548,519	34.0	1,398,305	50.4
总计	1,611,970	100.0	2,776,076	100.0

资料来源:同表 3(1)。

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昆明穆斯林人口分布结构的变迁,与昆明总体的人口分布结构特点是相一致的,即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特别是自 80 年代以来,城市人口从老城区向边缘城区转移,如表 3(4)所示。从 1990 年到 2000 年,昆明城市人口的分布由五华、盘龙两个区逐渐向边缘的西山和官渡两个区转移。

穆斯林人口分布结构之变迁与城市总体人口分布结构之变迁是一致的,这种变迁,对于作为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社群的穆斯林而言,有特别的意义,即人口由传统老城区向边缘新城区的转移,不仅是人口分布地理位置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这种变迁所标志的是整体社群结构的变迁。我们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待这一变迁:

首先,人口由传统老城区向边缘新城区的转移,意味着传统聚居形式的终结。改造后的老城区,通常变成了商业区或高档住宅区,许多普通穆斯林不得不迁离这里的街区,原有的聚居状态基本不再存在。

其次,意味着传统寺坊的终结。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人虽然迁走了,但寺是不动的。因此,我们今天看昆明城区清真寺的分布,六座清真寺皆位于今日城市的核心商业区,但穆斯林散居全城的各个角落。

再次,穆斯林迁离原有的居住区之后,多数情况是散居全城的各个角落,即使在某些小区形成一定程度的聚集,在今日中国的制度框架下,新建清真寺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因此,人与寺的分离几乎是中国内地所有城市的穆斯林不可避免的命运,昆明也如是。

如上所述,居住结构的变迁,为昆明穆斯林传统社群结构的终结加上了最后一个因素。20世纪末的昆明穆斯林社群,某种程度上就处于这样一种转型状态中。“族”与“教”的分离以及“人”与“寺”的分离所标志的,实际是信仰与生活的断裂。那么,是延续这样一种断裂,还是重建社群的结构?文化的变迁,朝向哪一个方向?

[收稿日期]2010-09-23

[作者简介]马雪峰(1978~)回族,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
昆明 650091

Muslim Communities in Kunming: 1274–2000

Ma Xuefeng

Abstract: In Yuan Dynasty, a comparatively larger Muslim community had been formed in Kunming city. During a period of nearly 600 years from the 13th century to the 19th century, this community had been developing peacefully in Kunming. As a result, five mosque-centered –Jama’ats came into being as the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pattern of Muslim in Kunming. However, the Muslim community was completely destroyed in “Xiantong Incident” in the middle of 19th century. During the next 100 years, the Muslim community of Kunming had been restored progressively. Therefore, by the end of the 1950s, the five mosque-centered –Jama’ats had been revived. Half a century later,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of “modernity”,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y structure has been changed in many aspects, which in turn led to its gradual disintegration.

Key words: Kunming; Muslim community; five-mosque-centered–Jama’ats; disintegration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ing Staff’s Supplement, Improvement and Managemen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and its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Wang Jiayi Zhao Mingre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minority regions and promoting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t is a fact that strengthening teaching staff’s supplement, improvement and management is a prerequisite and decisive facto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minority area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developing education in minority regions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suggested to solve the key problems: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in strengthening the teaching staffs in minority areas in new era; improving the treatment of teachers in minority areas; creating innovative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for teachers in minority areas; increasing the counterparts support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arrying out cultivation and training of bilingual teachers, improving teachers’ management level and strengthening research on teachers in minority areas.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teachers;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 countermeasure(See P.29)

① 1980年代以来,政府对城市地区新建清真寺管制甚严,一般情况下只允许恢复原有的清真寺,而不允许新建新的清真寺。